

# 夏衍与江南文化

## ——纪念夏衍 120 周年诞辰

周 斌

**摘 要：**夏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作为一位现代文化大家，夏衍的文化活动、文艺创作和各类著述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些思想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很好传承和大力弘扬。在纪念夏衍 120 周年诞辰之时，从地缘政治和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夏衍与江南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进一步深化夏衍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总体上来说，吴越文化元素是夏衍性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江浙俊杰贤达则对夏衍的思想、人格和作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夏衍的创作又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

**关键词：**夏衍；江南文化；文化基因；江浙俊杰；新的风格

**作者简介：**周 斌，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0) 06-0002-09

2020 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夏衍 120 周年诞辰。作为一位现代文化大家，夏衍的文化活动、文艺创作和各类著述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些思想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很好传承和大力弘扬。此前，关于夏衍的文艺创作及其各类作品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夏衍研究，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夏衍及其成就和贡献，以利于更好地了解与把握其思想文化遗产，则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依据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从人的层面来说，地理因素会影响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发展。同时，从地域文化的观点来看，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哺育一方人才。因此，从地缘政治和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夏衍与江南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进一步深化夏衍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 一、吴越文化元素是夏衍性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

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地域文化区域。江南的核心区域是“吴越”地区，所谓“吴越”地区，主要是指今天的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吴越”一词，始自春秋时期，当时的吴国约在今天的江苏一带，而越国则约在今天的浙江一带，于是后人便以“吴越”来称呼这个区域。因此，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它既是江浙的地域文化，也是江南文化的主体构成部分。

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历史上六朝以后的“吴越”地区，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吴越”地区，无疑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它形成了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应该看到，地域文化特点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客观自然环境在长期互相渗透与交互作用下逐步融合而显现出来的，它是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群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一方面，地域文化是在不断变化中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它往往随着该区域各类人群各种活动的不断展开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

发展变化而陆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淀下来；另一方面，它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始终保持着一些使之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品质。而在此过程中，诸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环境，常常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而规定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正因为如此，吴越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主要差异，也是由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等客观条件而自然形成的，并对该区域的人群产生了影响。由于江浙地区“水土柔和，人性柔慧”，故而形成了吴越文化“儒雅平和，崇文尚智”的特点。吴越地区民性较聪慧、灵活、坚韧；吴越人的性格往往外柔内刚、为人谦和、讲究礼节。而吴越地区的各种文化艺术，也注重追求精雅柔婉之美。

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夏衍，从小就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他所具有的平民情怀、奋斗精神和人文素养，主要来自于其从孩提时代到青年学生这段早期的人生经历在家庭和家乡的耳濡目染，以及早年所受到的各种教育和文化熏陶。

夏衍出生时，其原来富裕的家庭已经败落。他3岁时父亲突然病逝，家里日渐贫困，母亲徐绣笙带着6个孩子只好靠典当借贷和养蚕过日子。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14岁的哥哥到当铺做了学徒，大姐嫁给舅父的长子做了“填房”，三姐则被“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自然得到了母亲的宠爱，故而无论在人生态度、生活习惯还是人格品质等方面，母亲都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其母出生于浙江德清县的名门望族徐家，从小接受过很好的家教，属于大家闺秀。她虽然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却通情达理，能处处宽厚待人。<sup>[1]</sup>同时，她还知道许多文史掌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故事，并酷爱戏剧。大凡农村庙会演戏，不论是京剧还是绍兴大班等其他剧目，她都一定要去看，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结束才离开。<sup>[2]</sup>她为人很善良，不仅常常接济乡亲邻里中一些比自己家更加穷困的人，而且对夏衍祖母殴打和虐待婢女有强烈的反感，并反复叮嘱出嫁的女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买丫头。她思想很开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一辈子既不念佛更不烧香，从来没有跨过寺庙的门槛。<sup>[1](4)</sup>她性格也很坚强开朗，从不向生活中的困难低头，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克服这些困难。母亲的这些品格通过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夏衍的人格形成和道德规范，甚至她爱好戏剧和特别爱猫的癖好也传给了夏衍。

当夏衍到了读书年龄时，被其姑母接到身边去上学。姑母家是一个有钱的大家族，家中表兄们吃穿用的都是高档物品，而寄人篱下的夏衍所用的都是他们剩下来的东西。处于这样的环境，面对此类情况，夏衍心中充满了羡慕、自卑和委屈。其母亲察觉到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和烦恼，遂让才上了一年半小学的夏衍退学回家自学。到他12岁时，被舅舅接到身边读完了小学。虽然夏衍的考试成绩在学校里名列第二，但因为家里穷困潦倒已至断炊之境地，所以无钱继续升中学读书。他只好再次中断学业进了一家染坊去做学徒。半年的学徒生涯既使他品尝了工人劳作的辛苦，也由此得到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同时，对社会现状和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也有了初步了解。这一段生活体验使夏衍难以忘怀，他后来曾说：“在染坊当学徒的时间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劳动，特别是练工们手掌上的蜂窝趺，却一直凝记在我的心中。”<sup>[1](17)</sup>

由于他在小学读书时成绩优异，当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招生时，每个县可以保送两名优等生入学，于是他便被保送到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因为该校要培养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所以就要求学生有坚强的体质、健全的道德、丰富的知识、果毅的精神和娴熟的技能，夏衍在这几方面都受到了学校较严格的训练和培养。由于家境贫寒，他在校期间从未有过一双像样的鞋，在江南的梅雨季节里，他的一双脚总是浸在湿漉漉的鞋里。别的同学可以向校役定买点心，他却想都不敢想，甚至好朋友分一点给他，他也尝都不敢尝。凡此种种不仅磨练了夏衍克服困难的毅力，而且也培养了他努力奋斗的志气和不断拼搏的上进心。他认为：既然不能与其他同学在生活中比贫富，那就比成绩吧。“‘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头。”<sup>[1](21)</sup>于是，夏衍通过刻苦努力，

在校期间各方面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他后来曾回忆说：“当时，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两榜秀才’，因为每学期考试成绩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同时，每学期催缴膳杂费的榜上，我也经常‘榜上有名’。”<sup>[2]</sup>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让夏衍对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有了初步的体验和思考。由于他从小吃过苦，不仅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而且还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可以说，对于旧社会黑暗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少年时代就已经在夏衍心里扎下了根子。这也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sup>[3]</sup>同时，也使他形成了在困境中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品格。

20 世纪初，时局的动荡和社会的变迁使夏衍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与校园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鉴湖女侠”秋瑾的事迹使他深感触动。他曾说：“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 and 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乃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sup>[4]</sup>于是，夏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与一些追求进步的同学交朋友。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杭州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还与同学们一道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 2 期改为《浙江新潮》）。他在刊物上接连发表了《评杭州的四家日报》《印刷物也要管理的么》《你没有看见么》等一些抨击时弊的文章，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夏衍初步表达了自己改造旧社会、打碎黑暗制度的理想追求。显然，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的 5 年，是夏衍的思想品质和人生理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由于明清以后“浙东学派”的启蒙影响较大，其“经世致用”的观念在浙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已经深入人心。为此，虽然夏衍一直爱好文学和哲学，但当他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后，他在日本所选择学习的专业仍然是工科。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在国内学的就是工科，同时因为出身贫寒也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他已具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志向。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留学期间，严格的学习要求和一定的军事训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坚韧执着的“顽张”作风。夏衍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艺作品，并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日译本。这些书籍的阅读所获得的知识，与此前吴越文化中儒学传统的学习积累，以及对于苦难祖国前景的不断思考，让夏衍放弃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梦想，开始自觉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1924 年 11 月，孙中山途经日本时，夏衍和同学专门前去谒见孙中山，并当场经李烈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后担任了国民党（左派）海外部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夏衍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党。同年夏天，夏衍回国后在上海遇到了浙江贤达、国民党元老经亨颐，在他的指点下，决定留在上海观察局势发展再做今后打算。此后在同乡、同学蔡叔厚的机电公司里结识了浙江俊杰、中共地下党员张秋人、杨贤江等。在与他们的接触交谈中，他明确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就在该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夏衍在明治专门学校的同学郑汉先、庞大恩的介绍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如同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一样，夏衍也弃工从文，他广泛接触文艺界的朋友，翻译外国文艺作品，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撰文写作，开始走上了革命文艺之路。

夏衍在 1900 年至 1920 年期间，既受到吴越文化和儒学传统的熏陶，并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也受到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初步形成了其思想性格和理想追求。在 1920 年秋至 1927 年 5 月日本留学期间，他又受到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并在性格作风中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最终选择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的共产

主义方向。在其人生历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吴越文化中的儒雅平和、坚韧灵活、外柔内刚、讲究礼节等特点，可以说，吴越文化元素是夏衍性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例如，他在隐蔽战线曾执行和完成过许多重要任务，但却很少提及这些事情，甘当无名英雄；他曾给别人写过或修改过一些剧本，但却不愿意署名，不计较名利；他广交朋友，乐于助人，特别愿意帮助提携年轻人；他于“十年动乱”中受到摧残，“在8年7个月的监禁生活中受了很多苦，肩上的锁骨被打断，眼睛受到严重损伤，落下一条残疾的右腿，但他回来后，从不对人（即使对家里的人）多讲狱中的事情。别人问他‘文革’中的事，他也从来不肯多讲。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后，却常常对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反思”<sup>[5]</sup>；他把自己获得的一笔国际文化交流奖金捐献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他把自己的藏书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把自己收藏的“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书画等捐赠给浙江博物馆，还把自己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和一批邮票珍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给奖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其病情遽然转危之际，身旁人急着说“快去叫医生”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夏衍却纠正说：“不是叫，要说‘请’。”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他以自己的斯文和礼貌，在不经意间为其儒雅知识分子的形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二、江浙俊杰贤达对夏衍思想、人格和作风的影响

江浙地区历来以“人杰地灵”著称，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类优秀人才层出不穷；正是他们在各方面的建树和贡献，使江南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在夏衍的人生历程和革命道路上，在他的思想、人格和作风形成的过程中，不少江浙俊杰贤达在潜移默化中对其产生过较大影响。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杨贤江等，还是鲁迅、茅盾、胡愈之、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郑振铎、洪深、吴觉农、沈兹九等，都曾使夏衍在与他们的长期交往中耳濡目染，获益匪浅。其中以瞿秋白、周恩来、潘汉年对他的影响尤为显著。

瞿秋白是夏衍认识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瞿秋白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给夏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使之难以忘怀。在瞿秋白牺牲多年以后，夏衍在《追念瞿秋白同志》一文中曾真实、细致地记录了这种深刻印象。他说，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他介绍的同志并没有说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但是通过几次谈话，他就知道与他谈话的乃是著名的《赤都心史》的作者。而1931年正是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期，身处这样一个危险时期，瞿秋白给他的第一印象，乃是出乎意外的安详和平静，布置工作十分细致，态度很舒坦；这与同一时期某些领导人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时正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受到了党内“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和排挤，个人处境并不好。但是，在夏衍和他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受打击和排挤之后的那种委屈、沮丧的心情。在两人的日常谈话中，瞿秋白的谈吐非常乐观、潇洒和幽默；但当谈到一些具体工作时，他的态度则格外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他表现出强烈的同仇敌忾的情绪。瞿秋白那种旺盛的革命斗志，忘我的工作精神，及其在对敌斗争中所具有的高度警惕性，让夏衍在许多日常琐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体验到。夏衍认为：“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常常穿一件灰色的哗叽袍子，平顶头，举止斯文得很，善于欣赏各种美好的东西，读到一篇好的文章他会反复背诵，逢人介绍。可是，当接触到工作，接触到理论斗争，他就一变而为一个淬厉无前的勇猛的斗士。他的文章辛辣锐利，又是娓娓动人而富于说服力和逻辑性。”<sup>[6]</sup>从上述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夏衍对瞿秋白人格气质与个性特点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把握。对于斗争经验还不是太丰富的青年夏衍来说，见贤思齐，瞿秋白显然是他学习的好榜样。

同时，也正是在瞿秋白的同意和支持下，夏衍和阿英、郑伯奇才能答应明星影片公司的邀请，正式

进入电影界。此后，夏衍又担任了党的电影小组组长，并组织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开始了占领电影阵地的各项工作，从而在电影创作、理论批评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由此奠定了国产进步电影创作发展的坚实基础。倘若当年没有瞿秋白的同意和支持，夏衍等人无法顺利进入电影界开展各项工作，中国电影的发展也许会是另一种情景，夏衍的人生道路也肯定会有所不同。的确，瞿秋白和夏衍都是早期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他们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这种情怀表现在他们身上则都具有一种革命家和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也是才气横溢的文化人，这两种气质有机融合交织在一起，使他们既不同于一些职业革命家，也不同于一些单纯的文化人。<sup>[7]</sup>

作为“绍兴三杰”之一的周恩来（另外二杰是秋瑾和鲁迅），则是夏衍最敬重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夏衍曾长期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文化、新闻、统战、外事等各项工作，不仅与其交往最多，而且得到的指导和帮助也最多。对于夏衍来说，周恩来是其真正的良师益友。周恩来逝世以后，夏衍曾先后撰写了《巨星永放光芒——纪念周恩来同志诞生八十周年》《永远难忘的教诲》等纪念文章，深情回忆了周恩来的高尚品格和给予他的指导与帮助。

首先，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导下，夏衍的主要工作进行了跨界转换，他从文艺界进入新闻界，从主要从事文学、电影工作转换为主要从事新闻、统战工作，不仅拓展了工作领域，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与接触，在作风、气质、修养等方面也有了改善和提高。1937 年 8 月，夏衍奉周恩来之命与郭沫若一起创办了《救亡日报》，并担任该报总编辑，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负责编辑此报；皖南事变后，他又奉命到香港，参与创办了《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他又奉命到重庆进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并曾一度担任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则奉命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当该报刊被国民党查封后，他又奉命去新加坡，参加了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的工作；仅干了半年，即被当地政府“礼送出境”，重返香港，又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直到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奉调离开香港。虽然这十二年新闻工作的经历是十分曲折坎坷的，但夏衍却认为“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sup>[1](267)</sup>因为在此过程中，他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并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夏衍最初奉命创办《救亡日报》时有些畏难情绪，周恩来看到他面有难色，便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对他进行了开导，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形势发展，并要求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做好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工作；还告诫他不要怕困难，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此后，当他在办报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又带了这些自己认为很难处理的问题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又耐心地跟他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并再次帮助他明确了办报方针：“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夏衍回忆说：“事隔四十年了，但这一段话对我是毕生难忘的教诲。”<sup>[8]</sup>同时，夏衍还从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如何很好地在文艺界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说：“总理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事无大小，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在和周恩来相处的过程中，夏衍真切地感受到：“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他团结了干部，团结了民主党派，团结了知识分子，团结了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及时地

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评。”<sup>[8]</sup>周恩来的这些高尚品质，是夏衍在与其接触中亲身体会到的，并以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其次，夏衍从事外事工作，完全得益于周恩来的悉心指导。他说：“建国初期和1955年以后，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期，我曾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但因陈毅同志不同意我离开上海，我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我从事外事工作主要是在文化部的十年。”当他于1955年7月离开上海，调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周恩来在他报到前夕专门约他谈话，告诫他“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得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严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第二是外事工作授权不多，不能越权，更不能越轨。你开始做外事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对外活动中，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次谈了三个多小时，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也是终身难忘的教诲”<sup>[9]</sup>。此后，在各种具体的外事工作中，周恩来又通过言传身教，让夏衍逐步熟悉和掌握了外事工作的规律和方法，懂得了如何正确运用各种外交艺术，并由此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位优秀领导者。他曾先后担任中捷友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等职务，在各项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衍对周恩来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在《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曾说：周恩来仙逝时，因邓颖超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1957年、1959年、1964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sup>[1](3)</sup>在夏衍的人生道路上，周恩来无疑是他的“领路人”，是不断帮助、提携他的“贵人”。这种深厚的情谊，夏衍始终铭刻在心中。

潘汉年曾是夏衍的上级领导，但因为两人性格相近、关系亲密，故而也可以说两人是兄弟。他们彼此交往最多，相知也最深。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夏衍曾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过左翼文化运动、隐蔽战线的斗争和统战工作；1949年5月，他们又一起在陈毅领导下参加了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此后至1955年，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夏衍仍在其领导下分管上海文化工作。两人在长期的工作和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历了各种考验。夏衍孙女沈芸曾说，“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sup>[10]</sup>从已经出版的《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和《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中，可以看到夏衍在一些日记和信件中记下的与潘汉年交往的各种真实情况，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情谊是真挚而亲切的。同时，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是经得起考验的。例如，潘汉年被捕后曾有过一段假释时期，在此期间，潘汉年夫妇曾经探访过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等，但为了避免给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夫妇便回避了与夏衍见面。另外，在“文革”中，专案组为了审查夏衍，曾逼迫潘汉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潘汉年虽然身陷囹圄，却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材料，由此也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朋友真诚负责的态度。<sup>[10]</sup>同样，夏衍在“文革”中也被迫写过关于潘汉年的材料，这些材料也经得起历史检验。1982年“潘汉年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夏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潘汉年同志》的文

章，表达了他对这位尊敬的兄长、老友的真实情感和高度评价。他认为：“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sup>[11]</sup>这样的评价来自于他几十年来对潘汉年深入而真切的了解与认识。

的确，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瞿秋白、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是一群在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等方面颇为相似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党内构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sup>[7] (16)</sup>他们既具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革命毅力和奉献精神，又具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人格品质和道德情操。他们都出生在江浙地区，江南文化滋养和哺育了他们，使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因为他们的传承与贡献，让江南文化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 三、夏衍的创作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

尽管夏衍在各个历史时期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也从事过多种社会活动，但是，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介“书生”和“文人”，并非是职业革命家。与瞿秋白、周恩来、潘汉年相比，夏衍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始终没有放下手里从事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之笔。他能妥善处理好革命工作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坚持忙里偷闲，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通过勤奋创作，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各类文艺作品，2005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6卷、约920万字的《夏衍全集》就是最好的明证。可以说，在江南文化滋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夏衍，又以其独具个性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内容。

在夏衍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中，与江南文化直接有关的是他撰写的许多回忆和描写一批江浙俊杰贤达的纪念散文，由此他赞颂和弘扬了江浙文人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例如，前面所列举的那些著名的江浙俊杰贤达中的大多数人，夏衍都曾撰写过纪念文章。除此之外，他撰文纪念以及为他们的著作写过序文的还有经亨颐、陶晶孙、章锡琛、章汉夫、王尘无、于伶、袁牧之、应云卫、周巍峙等一批江浙俊杰贤达。在这些纪念文章和序文中，夏衍以朴实、细腻的文笔既记叙了与他们认识和交往的过程，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人品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评价，也抒发了其内心真挚、深沉的情感。其中如鲁迅、周恩来、洪深等人，夏衍曾写过多篇纪念文章。当然还有秋瑾，这位在夏衍年幼时就曾深深感动过他的“鉴湖女侠”，她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为此，夏衍不仅写过《秋瑾不朽》的纪念文章，而且还创作了多幕话剧剧本《秋瑾传》，作为秋瑾同乡的柯灵又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1983年，黄宗江与谢晋合作，在夏衍话剧剧本和柯灵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将其拍摄成传记片《秋瑾》，上映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使秋瑾的生平事迹和献身精神为当代更多的青年人熟悉与了解。

同时，夏衍的电影改编也为江南文化的艺术化展现和多元化传播作出了新的贡献。众所周知，茅盾的小说《春蚕》《林家铺子》和鲁迅的小说《祝福》，经过夏衍改编后搬上了银幕，这几部影片不仅影响颇大，而且也广受好评。他之所以选择这三部小说作为电影改编的对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内容、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描写的风俗人情等，都是他十分熟悉了解的浙江地区的人物和故事。为此不仅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而且还可以根据电影改编的需要适当补充一些新的情节和细节，使影片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生动。

《春蚕》是夏衍改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该片受到了当时电影界的高度重视，曾专门为影片上映召开了座谈会。参会者认为：“《春蚕》之出映，无疑是1933年影坛上的一个奇迹。”“这是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声，也可以说是新的电影文化运动一个发轫。”夏衍当时在谈到为何要改编这部作品时说：因为自己幼年在家里曾帮助母亲养过蚕，所以对小说所描写的蚕农生活很感兴趣。同时，觉得蚕

丝问题和蚕农破产的问题很值得关注，小说不仅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这些问题，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村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具有较普遍的社会意义。为此，他在改编时着重发挥了剧作的教育作用。而导演在摄制时也采取了“纪录电影”的方式，较好地凸显了影片的纪实风格。<sup>[12]</sup>无疑，改编拍摄后的影片一方面通过老通宝一家养蚕的遭遇，揭露了随着日本等外国蚕丝和人造丝对中国市场的侵占，中国丝织业濒临破产的状况；另一方面也真实、细致地展现了蚕农们辛劳的养蚕过程，勾勒了一幅江浙一带养蚕业的农村风俗画，普及和传播了江南蚕文化的有关知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的电影改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成为他进行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他于1956年改编了《祝福》，1959年改编了《林家铺子》。《祝福》作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拍摄的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国内外广受欢迎和好评，曾于1957年获得第10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58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周“银帽奖”。而《林家铺子》的艺术成就则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赞扬，认为它是电影改编的经典作品之一。该片于1983年获得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95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

对于为何选择这两部小说进行电影改编，夏衍曾在《杂谈改编》《漫谈改编》《谈〈林家铺子〉的改编》《对改编问题答客问》《给谢添同志的一封信》等文章和讲话中说过原因。简括而言，就是这两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小说中描写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他都比较熟悉和了解。夏衍青少年时代在杭州家乡的生活积累和对江南文化的熟知，使他在改编这两篇小说时生出许多创作灵感，并补充了不少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例如，《祝福》开头叙述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秋冬之交，他就知道这个季节江浙农家要做什么农活，所以他就增加了祥林母亲摘乌桕的动作；因为魏老二来做媒时，祥林母亲在家里不能没有事做，小说中可以不写，但电影剧本却不能不用形象来加以补充。又如，《林家铺子》里写到要过旧历新年时，也没有很具体的生活细节描写，于是夏衍想到了家乡过年时家家要供水仙花，还会裹上一个红纸圈圈，桌上的小茶碟也会摆上橘子等水果和各种糖果点心。于是他在剧本中就作了必要的增添。<sup>[13]</sup>电影主要是通过视觉画面来叙事写人的，所以对于影片拍摄来说，这些生活细节的增补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夏衍在改编这两篇小说时还着重强化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又遵循电影艺术创作规律，无论在环境描写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都通过情节、人物、细节的增删体现了一些新的创意，不仅深化了作品的主旨内涵，而且使人物个性也更加鲜明突出。例如，在《祝福》典型环境的营造上，剧作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鲁迅笔下浓郁的江南乡镇景观和特有的风俗人情，无论是对浙东偏僻小山村的描写，还是对镇上鲁四老爷家居环境的刻画，都体现了浙东地区的主要文化特色。同样，在《林家铺子》典型环境的描绘上，无论是对浙江杭嘉湖小镇地形风貌的描写，还是对小镇上各类商铺（尤其是林家铺子）商品陈设的渲染，都凸显了浙北杭嘉湖平原和水乡的诸多特征。特别是剧本结尾的描写：“一条溪水，不太宽，远山可以望见，一片江南鱼米之乡。一只脚划船在溪边划过。太阳灿然。船。林老板两手抱头，在船舱里沉思。”文字简洁，特点鲜明，既给导演的拍摄奠定了基础，也给其再创作提供了空间。当夏衍和茅盾一起看过影片试片以后，他又写信给饰演林老板的演员谢添，除了对演员表演提出一些建议外，还特别指出：“这是一个苦难的岁月，破产的小市镇。所以道具、服装，要防止富丽。茅盾同志说，小茶馆里的茶碗陈列得太整齐了，桔子糖果也太丰富、太划一了一些。已拍好了的可能很难改了，对今后的场面，要注意时代气氛、政治脉搏和细节真实。”<sup>[14]</sup>

同时，在典型性格的塑造方面，夏衍也根据剧作主旨和叙事的需要，对原著作了一些改动，使主要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形象更加鲜明。例如，夏衍在《祝福》中塑造祥林嫂的形象时，增加了她最后拿菜刀砍土地庙门槛的情节，以此表现她对封建宗教的失望和对社会恶势力的控诉。这一情节的增加当时曾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议，但多数意见是赞成这一改动的。窃以为，夏衍对原著人物这种改动的的生活依据可能来自于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既不念佛更不烧香，有位远房亲戚送给她一串念佛珠子，她丢在抽屉里从来没有用过，而且一辈子也不曾跨过寺庙的门槛。其母亲对宗教信仰的这种态度给夏

衍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他在刻画祥林嫂的形象时很自然地表现了她最终的态度转变和决然反抗。同时，原著中对贺老六的性格描写较简单，夏衍在电影剧本里通过一些情节和细节的演绎，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一个勤劳、忠厚的浙东山区农民形象，在银幕上通过演员的再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又如，夏衍在改编《林家铺子》时，对林老板的性格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调整，较深入地描写了其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林老板是一个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他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家、大商人、大小军阀、国民党官僚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与剥削；另一方面，林老板又是一个压迫人的剥削者，他可以压迫和剥削诸如农民、小商小贩，以及孤寡无依的朱三太、张寡妇等更弱小的底层民众。也就是说，林老板对豺狼是绵羊，但他对绵羊则是野狗。因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夏衍没有把林老板写成一个十足的老好人，没有让今天的观众对林老板有太多的同情，可以说既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是完全必要的。<sup>[15]</sup>显然，这样的电影改编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也使林老板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情绪更加复杂丰富，使这一人物的典型性更加明显。

另外，夏衍对于导演谢铁骊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电影剧本《早春二月》，不仅予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而且还亲自动手对剧本作了很多修改。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该小说和剧本所叙述的发生在浙东芙蓉镇的故事内容，所描写的萧涧秋、陶岚、文嫂等人物形象，以及小镇上的风俗人情等，夏衍都十分熟悉，所以他能执笔进行许多修改补充，以使剧本更加完善。据此拍摄的影片《早春二月》已成为谢铁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其清新、细腻、典雅的艺术风格历来为人称道，这其中也包含了夏衍的心血与贡献。

有的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情文化，是一种意境文化。这样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无疑，夏衍的文艺创作作为这样的江南文化增添了一些新的美学元素和美学风格。正如夏衍的老战友阳翰笙所说：“夏衍同志是杭州人，杭州出龙井茶，看夏衍同志的作品，有如在龙井茶中加上一颗橄榄，喝起来是淡淡的香甜，微微的苦涩，清芬、隽永，余味无穷。这就是夏衍作品的风格。”<sup>[16]</sup>这样的比喻对夏衍作品美学风格的概括是形象而准确的。总之，江南文化哺育了夏衍，夏衍又为江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前贤往事，尽成追忆，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却将永传于后世。

## 参考文献：

- [1] 夏衍. 懒寻旧梦录(增补本)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
- [2] 夏衍. 我的家史 [N]. 文汇报, 2015-2-6.
- [3] 夏衍. 走过来的道路 [J]. 收获, 1958 (3).
- [4] 夏衍. 秋瑾不朽 [N]. 人民日报, 1979-12-5.
- [5] 沈宁, 沈旦华. 我们的爸爸夏衍 [N]. 浙江日报, 1995-11-1.
- [6] 夏衍. 追念瞿秋白同志 [J]. 文艺报, 1955 (12).
- [7] 沈芸. 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15.
- [8] 夏衍. 巨星永放光芒 [N]. 人民日报, 1978-3-2.
- [9] 夏衍. 永远难忘的教诲 [J]. 世界知识, 1989 (6).
- [10] 沈芸. 祖父夏衍与隐蔽战线(下) [N]. 北京青年报, 2018-4-28.
- [11] 夏衍. 纪念潘汉年同志 [N]. 人民日报, 1982-11-23.
- [12] 程步高等. 《春蚕》座谈会 [N]. 晨报, 1933-10-8.
- [13] 夏衍. 对改编问题答客问 [J]. 电影创作, 1963 (6).
- [14] 夏衍. 给谢添同志的一封信 [J]. 大众电影, 1959 (4).
- [15] 夏衍. 谈《林家铺子》的改编 [J]. 电影创作, 1959 (3).
- [16] 阳翰笙. 向夏衍同志学习 [J]. 文艺界通讯, 1986 (2).